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從職方到經方：古代方技、社會與國家研究之一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4-2411-H-004-028-

執行期間：94年08月01日至95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計畫主持人：金仕起

計畫參與人員：陳珈貝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0 月 17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從職方到經方：
古代方技、社會與國家研究之一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4-2411-H-004-028-

執行期間：94 年 8 月 1 日至 95 年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金仕起

計畫參與人員：陳珈貝

成果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處理方式：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中華民國 95 年 10 月 17 日

從職方到經方： 古代方技、社會與國家研究之一

中文摘要

這裡的「職方」，意義本於《周禮》，指的是古代封建邦國中掌握風土、人民與物產的一類職官。這裡的「經方」，則取義於《漢書》〈藝文志〉，是晚周秦漢藉方藥治療疾病的一類實用技術。「職方」與「經方」的指涉對象不一，如前者的性質是王官職守，後者是醫療技術；前者之方指方位、方土、方國，後者則指方法、技術、配方；前者與地理風土知識關係密切，後者涉及疾病認識與藥物配伍。這項研究之所以連繫「職方」與「經方」，主要目的在探討「職方」之官所掌握的職業知識與晚周秦漢「經方」之術背景知識間的可能關係。這項研究試圖回答以下問題：一、周秦漢有關地理風土的認識如何形成，經歷了哪些轉變？二、在上述認識中，不同地理風土和人體、疾病與處方的效驗有哪些關係？三、從「職方」與「經方」知識背景的關係看，統治技術與醫療方法有無關係？有何關係？

目前研究初步發現：一、周秦漢有關地理風土的認識與對政治疆土及宇宙結構的認識是一體的。其重要特徵之一，是包括了上（天）下（地），由中央（內）與四方四維（外）形成的所謂「二繩四鈞」的三維時空結構。這一結構性認識的來源甚早，可能在新石器時代即已形成，但形諸具體文字的時間則可能遲至晚周。二、有關不同地理風土與人體特質、疾病成因及藥物效驗關係的認識，基本反映了上述「二繩四鈞」的宇宙結構。而晚周人體氣論的形成，秦漢帝國就境內各地神祇系統所作的重新調整，以及漢末神僊家、民間宗教對宇宙萬物所進行的階序分類，也對上述的認識構成程度不等的影響，增添了新的內容。三、上述「二繩四鈞」結構的形成與轉變，與古代國家遂行國土控制的需求相應。古代中國政治體制從封建分立到郡縣統一的发展，使得風土、人體、疾病與藥物的關係隨之重組，疾病的治療在一定意義上襲用了國家控制疆土的模式，可以說，從「職方」職業知識到「經方」療病之術的發展，是回應了上述政治控制技術的發展。

關鍵詞：職方、經方、方術、社會史、醫療史

From Chi-fang to Chin-fang: A Study on Ancient Fang-chi, Society and State

Abstract

“Chi-fang,” according to *Chou-li*, was a group of official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land, labor, and goods in different areas of Chou. “Chin-fang,” defined by *Hanshu Bibliographical Treatise*, was a kind of method for curing diseases.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fang and Chin-fang. 1. Chi-fang was a unit of government, while Chin-fang was a kind of method. 2. “Fang,” in Chi-fang, referred to direction, territory, or state; but in Chin-fang, it meant method, technique or recipe. 3. The practice of Chi-fang mainly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geography, however, Chin-fang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knowledge of diseases and medicine. However, the reason I put Chi-fang and Chin-fang together is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knowledge Chi-fang professed and the method Chin-fang practice. There are three questions I would like to answer: 1. How did the geographical knowledge take shape and transform from Chou to Han? 2. How did ancient people recogniz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geographical factors, causes of diseases and effects of medicine? 3. What would be the possib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way of political control and medical treatment?

To those questions I proposed, my pilot survey shows: 1. The concept of geographical structure combined with the recognition of political territory and order of cosmos as an integrated whole in ancient China. This characteristic structure was consisted of a three-dimension diagram including heaven(above), earth(below) and a center surrounded by eight directions. 2.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geography, diseases and medicine basically reflected this geographical structure. Besides, the movement searching for immortality rised in late Chou, the reorganization of deities system in Chin and Han, and the readjustment of hierarchy of all creatures on earth in late Han all contributed to these relationships. 3. Those relationships among land, body, illness and medicine reflected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system from late Chou. And the logic embodied in practice of Chin-fang were correspondent to those changes in ways of political control.

Keywords: Chi-fang, Chin-fang, Fang-shu, social history, medical history

報告內容

一、前言

「職方」一詞，見於《周禮》、《逸周書》〈職方〉與《禮記》〈曲禮〉，是封建邦國掌理風土、人民、物產與禮俗的一類職官。據《周禮》〈職方氏〉，其職「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又與「土方氏」、「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邊師」諸官聯事，可以說，他們不但是協助封建統治者管理國家的重要官守；在官師合一的時代，也不啻是古代輿地、博物知識的淵藪。他們的職權反映其時封建國家的統治理念與技術，他們的職業知識也可以瞭解古人對空間結構、風土、人物的分類與認知，為研究、分析晚周秦漢所謂「地形」、「地理」（《淮南子》〈墜形訓〉、《漢書》〈地理志〉）、「河渠」、「溝洫」（《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輕重」（《管子》〈輕重篇〉）、「貨殖」（《史記》〈貨殖列傳〉）、「形法」（《漢書》〈藝文志〉），及「方怪」（《史記》〈封禪書〉）等實用技術的發展提供重要線索。

「經方」，是晚周秦漢新興方技之一。《漢書》〈藝文志〉指出：「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換言之，「經方」主要是藉由藥物、飲食以治療疾病的一類實用技術。這類技術以有關人體、疾病的認識為基礎，涉及了對飲食、藥物的氣味、寒溫及調製技術的掌握。而體裁類似的出土文獻，如睡虎地秦墓《日書》〈詁〉篇、周家臺秦墓《治病方》、馬王堆漢墓《五十二病方》，虎溪山漢墓《美食方》，及早灘坡《治百病方》則顯示，它們的內涵往往還與《漢志》「雜占」所謂「變怪詭咎」等數術有所重疊，可以反映古人的生命觀、宇宙觀，及對風土、物種的分類與認識，也無疑是流傳較廣的一類衛生技術。深入理解「經方」這類資料不僅有助理解古代醫療技術發展與其文化條件間的關係，也提供了觀察、研究古代人群生活實態與民俗慣習的重要門徑。

「職方」與「經方」的指涉對象固然不一，如前者的性質是王官職守，後者指醫療技術；前者之方指方位、方土、方國，後者則指方法、技術、配方；前者主要掌握地理風土，後者則主要涉及人體、疾病與藥物配伍的知識。但本研究之所以連繫「職方」與「經方」，主要係有見於它們在知識背景上頗具類通之處，如《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所謂「正東曰青州，

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而《素問》〈異法方宜論篇〉載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對曰：「地勢使然也。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為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兩者顯然皆強調風土、地勢因素對人群生活的影響，也相當重視對時空結構與不同地域之風土、人、物的認識。而本研究之目的，即旨在探討「職方」之官所掌握的風土知識與晚周秦漢「經方」所涉療疾之術間的可能關係。我們希望藉由此一研究，可以釐清周秦之際封建王官之學與新興民間技術間的互動過程，而官方的統治觀念、管理技術又和民間的醫療技術具有哪些可能的關聯。

二、研究目的

這項研究試圖回答以下問題：

一、殷周秦漢時期有關地理風土的認識如何形成，經歷了哪些轉變？在這，我著重探討的問題是，從《周禮》〈職方氏〉等性質類似的資料看來，古人如何想像他們生存其上的空間，在不同時期的這類想像中，哪些因素具結構性意義？這些結構性因素為什麼特別受到注視？又有哪些歷史因素可資解釋？

二、不同地理風土和人體特質、疾病成因，及治療處方的效驗有哪些關係？在這兒，我想瞭解的是，從馬王堆漢墓《五十二病方》等相關「經方」文獻來看，人身各類疾病，以及治療疾病的不同處方能否根據上述古人有關地理風土的認識加以分類，並找到可供推計的組織邏輯？這類組織邏輯的特色又何在？

三、從文本性質來看，「職方」與「經方」這兩類資料有無可資比較之處？比如說，「職方」資料所反映的古代國家政治控制觀念或技術與「經方」相關文獻所顯示的醫療觀念或技術有無類通之處？有何關係？它們的關係能不能反映中國古代方技「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的特色？

三、文獻探討

本研究嘗試探討「職方」官守職業知識的重點在於：一、古人如何認識與分類空間，及生息其上的人、物；二、不同類別、屬性的空間和人、物之間有哪些可能的關係。就前者而言，楊寬、劉慶柱等人對古代陵寢、城邑位向、結構

的研究¹；杜正勝、劉增貴從禮俗、倫理、方術角度探討古代居室建築的空間格局²，李零、Nathan Sivin 就古代宇宙結構與政治秩序相關性所作之研究³，提示我們古人的地理風土觀念，必須擺在「天」的背景下理解，也不能忽視其與政治控制技術間的關係。就後者而言，江紹原⁴、張光直⁵、林巴奈夫⁶、中鉢雅量⁷、Donald Harper⁸、山田慶兒⁹、杜正勝¹⁰，及 Roel Sterckx¹¹等人的研究則從宗教、禮俗、政治權力或醫療的角度為提供了解讀不同空間中人、物之間關係的架構。

就古代「經方」之學的發展論，李建民曾指出，「經方」具有「方先於藥」、「以病統方」的特性，較少涉及病因、病理和證候的描述，而且經驗的內容不斷累積¹²。另一方面，山田慶兒曾經指出：「水系模型，是在中國醫學的體系化階段時，被作為生理學的基本模型而採用的」¹³。儘管如此，晚周以下傳統醫學有關人體結構的認識，如李建民所描述、分析，走上了以天道數術為背景、為指導原則的道路¹⁴。但借水、地為喻以認識人體的傳統是如何出現的？對水、地的認識是否因數術化身體觀的成立，而在傳統方技中失去了立足點？或者說，它們又往哪兒去了呢？

¹楊寬，《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劉慶柱，《古代都城與帝陵考古學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²杜正勝，〈宮室、禮制與倫理〉，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台北：允晨文化，1992）；〈內外與八方——中國傳統居室空間的倫理觀和宇宙觀〉，收入黃應貴編《空間、力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劉增貴，〈門戶與中國古代社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4（1997）；〈秦簡《日書》中的出行禮俗與信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2：3（2001）。

³Nathan Sivin, "State, Cosmos, and Body in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B.C.," *HJAS* 55:1 (1995); 李零，〈中國古代居民組織的兩大類型及其不同來源——春秋戰國時期齊國居民組織試析〉，收入氏著《李零自選集》（西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中國古代地理的大視野〉、〈說早期地圖的方向〉，俱收入氏著《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說漢陽陵「羅經石」遺址的建築設計〉，《考古與文物》2002：6；

⁴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

⁵張光直，〈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飾〉，收入氏著《中國青銅時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Kwang-chi Chang,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⁶林巴奈夫，《神と獸の紋様學——中國古代の神かみ》（吉川：弘文館，2004）。

⁷中鉢雅量，〈中國古代の動物神崇拜について〉，《東方學》62（1981）。

⁸Donald J. Harper, "A Chinese Demonography of the Third Century B. C.," *HJAS* 45:2 (1985); "Wang Yen-shou's Nightmare Poem," *HJAS* 47:1 (1987).

⁹山田慶兒，《本草と夢と鍊金術——物質的想像力の現象學》（東京：朝日新聞社，1997）。

¹⁰杜正勝，〈古代物怪之研究（上）——一種心態史和文化史的探索〉，《大陸雜誌》104：1-3（2002）。

¹¹Roel Sterckx, *The 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¹²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周秦變革期〉。

¹³山田慶兒，《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台北：三民書局，2003），〈中國醫學的思想性風土〉，頁49。

¹⁴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1）。

澤田瑞穂¹⁵、林富士¹⁶、工藤元男¹⁷、劉樂賢¹⁸、山田慶兒¹⁹，以及廖育群²⁰等人對出土及傳世醫方之書、擇日之術中治療方法的研究顯示，「經方」的製作與操作和《漢書》〈藝文志〉所謂「雜占」數術頗有重疊，反映理解「經方」這類技術的內涵除了涉及對藥、物特性的理解外，和對空間、時間、人、物間互動關係的控制密不可分。也可以說，「經方」的發展，除了與「本草」等傳統藥物學知識的關係外，似乎自始即與數術——古人對空間、時間、人、物等因素相互關係的認識——的發展有關。不過，這與前述數術化的身體觀的發展在時間序列上的先後，則顯然有待進一步研究。

第三、就「經方」和「本草」的關係論，目前的研究尚不多見。除了傳世大量討論「本草」的文獻之外，大形徹²¹、龜田一郎²²等人對本草與神僊方術淵源的研究，則有助於廓清「本草」的性質，及其與「經方」的可能關係。此外，古代詩歌辭賦也提供了古人對各類物種的豐富資料，傳統時期的有關研究，也有助於瞭解古人對各類名物的認識²³。

四、研究方法

這個研究計畫的主要著眼點是「經方」這類技術知識的源流與社會政治結構及禮俗文化間的關係。計畫涉及的基本資料則有兩大類，一類是考古出土遺址、實物與文字資料，一類則以傳世文獻，特別是禮俗、方技文獻為主。除了借重如考古學、人類學、藥劑學與地理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外，我的研究主要以文本和圖象分析為主。

¹⁵澤田瑞穂，《中國の呪法》（東京：平河出版社，1984），〈禁術考〉。

¹⁶林富士，〈試論漢代的巫術醫療法及其觀念基礎——「漢代疾病研究」之一〉，《史原》16（1987）。

¹⁷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簡「日書」になる病因論と鬼神の關係について〉，《東方學》88（1994）。

¹⁸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¹⁹山田慶兒著、廖育群譯，〈夜鳴之鳥〉，收入《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

²⁰廖育群，《岐黃醫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醫者意也——認識中國傳統醫學》（台北：三民書局，2003），〈咒禁療法——「意」的神祕領域〉，頁69-86。

²¹大形徹，〈本草と方士の關係について〉，《人文學論集》8集（1990）；〈《神農本草經》の神仙觀〉，《東方宗教》77（1991）。

²²龜田一郎，〈オカルティズムより見た中國の服芝行為に就いて——巫祝・神仙家と催幻覺性菌類——〉，《東方宗教》89（1997）。

²³如(唐)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北京：中華書局，1985）；陸璣撰、(明)毛晉參，《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北京：中華書局，1985）；(宋)蔡元度，《毛詩名物解》（台北：大通書局，1969）；(清)焦循，《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清)趙佑，《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校正》（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童士愷，《毛詩植物名考》（上海：公平書局，1924）。

晚周以前，學在官府。儘管「經方」這套治療疾病的技術與民間的實用知識傳統關係密切，但文獻有闕，考古發現不是相當罕見，便是可遇不可求。因此，我在探討經方這一系知識的來源時，將以《周禮》〈職方氏〉、《尚書》〈禹貢〉與秦漢以後《史記》、《漢書》的河渠、地理、溝洫等志書等古代典籍所載之職官分劃為典型，結合考古出土實物與圖象資料甄別、建構「職方」這類官屬在古代國家中的角色，它們與其他相關職官間的連繫，釐清這類官守職業知識的大致內容與範圍，並分析國家統治技術，以及人群生活日用在這類職業知識傳統形成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其次，我將分析戰國以下，民間學術中和古典職方之官的職業傳統可能有所連繫，但面貌並不全然一致的幾種不同的知識傳統，這包括《山海經》中所反映的地理概念與對山川百物的認識，《管子》〈輕重篇〉有關相地、貨殖之術的討論，以及阜陽漢簡《萬物》中藥物學知識的內容，並試圖考察晚周秦漢社會、政治情勢對這類知識可能具有的影響。

第三、我將針對出土經方之書的體例與內容進行分析，設法釐清其中飲食、藥物知識的來源，操作咒詛法術的心態、推理基礎，以及調和劑的指導原則，說明它們和前述晚周秦漢時期地理、藥物知識的可能關係。這部分的研究對象主要包括虎山漢簡《美食方》、周家臺秦簡《病方》、睡虎地秦簡《日書》〈詁篇〉、馬王堆漢帛《五十二病方》等諸方書、《武威醫簡》及懸泉置所出相關條文。

五、結果與討論

目前研究初步發現：

一、周秦漢有關地理風土的認識與對政治疆土及宇宙結構的認識是一體的。其重要特徵之一，是包括了上（天）下（地），由中央（內）與四方四維（外）形成的所謂「二繩四鈎」的三維時空結構。這一結構性認識的來源甚早，可能在新石器時代即已形成，但形諸具體文字的時間則可能遲至晚周。

二、有關不同地理風土與人體特質、疾病成因及藥物效驗關係的認識，基本反映了上述「二繩四鈎」的宇宙結構。而晚周人體氣論的形成，秦漢帝國就境內各地神祇系統所作的重新調整，以及漢末神僊家、民間宗教對宇宙萬物所進行的階序分類，也對上述的認識構成程度不等的影響，增添了新的內容。

三、上述「二繩四鈎」結構的形成與轉變，與古代國家遂行國土控制的需求相應。古代中國政治體制從封建分立到郡縣統一的發展，使得風土、人體、疾病與藥物的關係隨之重組，疾病的治療在一定意義上襲用了國家控制疆土的模式，可以說，從「職方」職業知識到「經方」療病之術的發展，是回應了上述

政治控制技術的發展。

六、計畫成果自評

這一研究應當具有以下兩項意義：

一、透過對「職方」地理知識與「經方」療疾技術的比較與分析，釐清古代身體秩序、宇宙秩序與政治秩序之間的可能關係。意思是，古人對身體、宇宙與政治秩序的認識是一體的、相應的。

二、正確理解傳統方術的源流，必須適當考慮政治這項因素的作用。以本研究為例，「經方」作為一種實用技術，它的發展並非全然取決於效驗，相反的，它在運用諸如藥物或法術以治療人身疾病的過程中，事實上採取了類似國家權力機構控制疆土的形式。

有關這一研究的成果，我將在 2007 年以後陸續寫成論文，並結集為專書發表刊佈。

七、主要參考文獻

1、基本史料

(1)、出土資料

Donald Harper, *The "Wu shih erh ping fang" : Translation and Prolegome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 D. Thesis, 1982).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安徽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萬物》〉，《文物》1988：4，頁 36-47 轉 54。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長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

Donald Harper, *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The Mawangdui Medical Manuscripts*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8).

馬繼興等輯校，《敦煌醫藥文獻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編，《漢陽陵》（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

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

局，200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沅陵虎溪山一號漢發掘簡報〉，《文物》2003：1。

(2)、傳世文獻

《尚書》(台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81)。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台北：文津出版社影新校標點本，1987)。

《周禮》(台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81)。

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7)。

安井衡，《管子纂詁》(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1976)。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

司馬遷著，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台北：天工書局，1989)。

王先謙，《漢書補注》(台北：藝文印書館影武英殿本，1981)。

晉·張華著、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台北：明文書局，1980)。

(魏)吳普著，尚志鈞等輯校，《吳普本草》(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7)。

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

明·李時珍編纂；劉衡如、劉山永校注，《本草綱目》(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

明·繆希雍撰，《神農本草經疏》(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顧元交撰，《本草彙箋》(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1994)。

劉渡舟等編，《傷寒論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

宋書功主編；劉渡舟審定，《金匱要略廣注校證》(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

沈李龍纂，《食物本草會纂》(長沙：岳麓書社，1994)。

(元)忽思慧撰，江潤祥、胡秀英編註，《飲膳正要新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

2、相關研究

(1)、論著

(唐)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北京：中華書局，1985)。

(唐)陸璣撰、(明)毛晉參，《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宋)蔡元度，《毛詩名物解》(台北：大通書局，1969)。

(清)焦循，《毛詩物名釋》

(清)趙佑，《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校正》(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童士愷，《毛詩植物名考》(上海：公平書局，1924)。

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

中尾萬三，《科學(本草 思潮)：支那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34)。

鍾毅，《李時珍與《本草綱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石田秀實，《からだのなかのタオ：道教の身体技法》(東京：平河出版社，1977)。

余巖，《古代疾病名候疏義》(台北：自由出版社，1972)。

劉志清，《詩經植物圖解》(台北：不著出版處，1984)。

岡元鳳，《毛詩品物圖攷》(台北：廣文書局，1985)。

白井光太郎著、木村陽二郎編，《本草學・本草學史研究》(東京：科學書院，1985)。

中國藥學會藥學史學會編，《李時珍研究論文集》(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

石田秀實，《气流れる身体》(東京：平河出版社，1987)。

林富士，《漢代的巫者》(臺北：稻鄉出版社，1988)。

山田慶兒，《夜鳴く鳥：醫學の咒術と傳説》(東京：岩波書店，1990)。

石田秀實，《中國醫學思想史：もう一つの醫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

坂出祥伸，《道教 養生思想》(東京： 社，1992)。

廖育群，《岐黃醫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

山田慶兒，《本草と夢と鍊金術と——物質的想像力の現象學》(東京：朝日新聞社，1994)。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三浦國雄，《气の中國文化：气功・養生・風水・易》(大阪：創元社，1994)。

山田慶兒編，《東アジアの本草と博物學の世界》(京都：思文閣，1995)。

石田秀實，《こころとからだ：中國古代における身体の思想》(福岡：中國書店，1995)。

張延昌、朱建平編著，《武威漢代醫簡研究》(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6)。

- 王劍主編，《李時珍學術研究》（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6）。
- 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簡よりみた秦代の國家と社會》（東京：創文社，1998）。
- 李零，《李零自選集》（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 三浦國雄、堀池信夫、大形徹編集，《道教 生命觀 身體論》（東京：雄山閣，2000）。民族所圖書館
- 李建民，《方術・醫學・歷史》（台北：南天書局，2000）。
- 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
- 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 李零，《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 石田秀實，《東アジアの身体技法》（東京：勉誠出版，2000）。
- 苟萃華，《醫藥雙絕：李時珍與本草綱目》（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0）。
- 潘富俊著、呂勝由攝影，《楚辭植物圖鑑》（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2）。
- 山田慶兒，《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台北：三民書局，2003）。
- 廖育群，《醫者意也——認識中國傳統醫學》（台北：三民書局，2003）。
- 劉樂賢，《簡帛數術文獻探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錢超塵等主編，《李時珍研究集成》（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3）。
- 劉樂賢，《馬王堆天文書考釋》（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
-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店，2004）。
- 童書業，《童書業地理歷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4）。
- 高明乾等著，《詩經植物釋詁》（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2)、論文

- 中尾萬三，〈山海經を讀む（續）〉，《本草》18-20（1934）。
- 高去尋，〈山海經的新評價〉，《禹貢》1：1（1934）。
- 張公量，〈跋山海經釋義〉，《禹貢》1：1（1934）。
- 吳維亞，〈山海經讀後感〉，《禹貢》1：1（1934）。
- 王以中，〈山海經圖與職貢圖〉，《禹貢》1：3（1934）。
- 顧頡剛，〈五藏山經試探〉，《史學論叢》第一冊（1934）。
- 賀次君，〈山海經與職貢圖的討論〉，《禹貢》1：8（1934）。
- 曹婉如，〈五藏山經和禹貢中的地理知識〉，《科學史集刊》1958：1。
- 何祚成，〈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藥物〉，《新醫藥學雜誌》1973：2。
-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中有關藥物制劑的文獻考察〉，《藥學通報》14：

9 (1979)。

馬繼興，〈王堆漢墓醫書中藥物劑量的考察〉，《中藥通報》1981：3。

尚志鈞，〈《五十二病方》藥物炮制概況〉，《中藥通報》1982：6。

黃道生，〈從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藥物探討古代預防醫學思想〉，《浙江中醫雜誌》1983：8。

趙有臣，〈《五十二病方》中幾種藥物的考釋〉，《中華醫史雜誌》15：2 (1985)。

伊藤清司，〈山海經の民俗社會的背景〉，《國學院雜誌》86：11 (1985)。

馬繼興，〈馬王堆漢墓醫書的藥物學成就〉，《中醫雜誌》1986：5、6、7、8。

尚志鈞，〈從藥物產地看《五十二病方》的產生時代〉，《湖南中醫學院學報》1986：4。

林富士，〈試釋睡虎地秦簡中的「癘」與「定殺」〉，《史原》15 (1986)。

林富士，〈試論漢代的巫術醫療法及其觀念基礎——「漢代疾病研究」之一〉，《史原》16 (1987)。

劉麗仙，〈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藥物〉，《中國醫藥學報》1987：2。

劉綱，〈「武威漢代醫簡」的藥物炮製〉，《中華醫史雜誌》17：1 (1987)。

林富士，〈試釋睡虎地秦簡《日書》中的「夢」〉，《食貨月刊》復刊 17：3-4 (1988)。

張志業，〈文物工作者精心整理研究阜陽漢簡——我發現最早本草古籍《萬物》〉，《先秦、秦漢史》1988：6。

劉麗仙，〈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藥物鑒定研究〉，《考古》1989：9。

張振平，〈《萬物略說》商討一則〉，《文物》1989：1。

杜正勝，〈戰國的輕重術與輕重商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2 (1990)。

趙仕光，〈山海經有關藥物的記載〉，《貴州文史叢刊》1990：2。

金祖孟，〈山海經中的渾天說〉，《歷史地理》8 (1990)。

大形徹，〈本草と方士の關係について〉，《人文學論集》8集 (1990)。

周一謀，〈阜陽漢簡與古藥書《萬物》〉，《醫古文知識》1990：1。

Ming-chorng Hwang, *Ming-tang: Cosmology, Political Order and Monuments in Earl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Harper, Donald J. 1997.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Manuscripts Related to Natural Philosophy and the Occult. In *New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Inscriptions and Manuscripts*, ed. Edward J.

Shaughnessy, pp. 223-252.

郭偉民，〈沅陵侯吳陽墓發掘和竹簡整理概況（摘要）〉，見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第六期（2000.5）網頁：http://www.pku.edu.cn/academic/archeology/center/structure/main_3/g/16.html。

林富士，〈試論中國早期道教對於醫藥的態度〉，《臺灣宗教研究》1:1(2000)。

林富士，〈頭髮、疾病與醫療——以中國漢唐之間的醫學文獻為主的初步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1(2000)。

李建民，〈艾火與天火——灸療法誕生之謎〉，《自然科學史研究》21:4(2002)。

李建民，〈《本草綱目·火部》考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73:3(2002)。

杜正勝，〈古代物怪之研究（上）——一種心態史和文化史的探索〉，《大陸雜誌》104:1-3(2002)。